



云南民族文化丛书 / 总主编 和少英

云南民族文化遗产与变迁卷 / 主 编 高登荣 黄彩文



云南少数民族 口述档案开发利用研究

子志月 ○ 著

面对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冲击影响，云南边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文化生态环境发生了剧烈变化，特别是一些依靠口传心授进行传承的文化遗产面临不断消失或处于濒危境地的严峻挑战，给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带来诸多挑战和困难。若不及时抢救保护，许多珍贵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将濒临消亡。

为此，本书在系统梳理学术界关于口述档案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回顾我国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抢救保护的历史和总结云南少数民族口述档案发掘利用的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云南少数民族口述档案开发利用的对策建议，为保护和传承云南民族文化提供了新的思路。



云南民族文化丛书 / 总主编 和少英

云南民族文化遗产与变迁卷 / 主 编 高登荣 黄彩文



云南少数民族 口述档案开发利用研究

子志月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云南少数民族口述档案开发利用研究 / 子志月著

— 昆明 :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4

(云南民族文化丛书. 云南民族文化遗产与变迁卷)

ISBN 978-7-5482-2135-7

I. ①云… II. ①子… III. ①少数民族—民族文化—
口述档案—档案研究—云南省 IV. ①K28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54818号

策划编辑: 邓立木 / 责任编辑: 石 可 / 装帧设计: 贺 涛



云南民族文化丛书 / 总主编 和少英

云南民族文化遗产与变迁卷 / 主 编 高登荣 黄彩文

云南少数民族口述档案开发利用研究

子志月 著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 昆明市五华区教育委员会印刷厂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0.75

字 数: 220千

版 次: 2015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2-2135-7

定 价: 31.00元

社 址: 云南省昆明市翠湖北路2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

邮 编: 650091

电 话: (0871) 65031071 65033244

网 址: <http://www.ynup.com>

E-mail: market@ynup.com

本书由中央财政专项资金支持项目“民族文化专业能力实践基地建设”经费资助出版

《云南民族文化丛书》编委会

总 主 编：和少英

学术指导：马 戎 杨圣敏 王铭铭 彭兆荣 周 平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四代 王子华 王明东 方 桢 刘劲荣

那金华 李国文 李若青 张宗红 杨宗亮

陈 斌 罗海麟 赵静冬 郭飞平 高登荣

黄彩文 韩忠太 雷 兵

“云南民族文化丛书”总序

和少英*

云南因民族众多、文化丰富多样而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的一个天然宝库。自人类学与民族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现代学科传入中国以来，基于云南的田野调查所取得的一系列研究成果，云南在中国人类学与民族学学科的传播与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有关云南的人类学与民族学的调查和研究发端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西方传教士、专家学者、探险家以及外交官等先后进入云南，或窃绘山川险要，或记述边地的风土民情，并以此寻求通向中国的“走廊”或通道（譬如，英国铁路工程师兼情报官员 H. R. Davies 就写过一本非常流行的书，将云南称为“联结印度与扬子江的链环”——此书已于十多年前由我和我的同事们翻译出版）。其后，许多国内的专家学者亦相继来到云南，与云南本土学者一道使这里的人类学与民族学学科逐渐开始发展起来。

纵观云南的人类学与民族学学科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可以说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逐步繁荣发展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30—40年代。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许多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迁至云南，大批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荟萃于此。尤其是吴文藻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建立了云南大学—燕京大学实地调查工作站，由此开启了中国人类学与民族学的“魁阁时代”。以费孝通、陶云逵、许烺光、田汝康等为代表的“魁阁”成员，对云南各地的经济生活、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城乡关系的变迁等方面做了专题性的调查研究。其研究成果和社区研究方法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为推动学科的中国化进程做出了巨大贡献。

第二个阶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党和政府为了巩固边疆和加强民族团结，组织开展了大规模的民族调查与识别，云南成为当时全国民族问题研究和民族工作的重镇。这一时期的云南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

* 和少英，男，纳西族，云南民族大学副校长，教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暨云南省民族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博士生导师，兼任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所长、云南省民族文化研究院院长等职。

主要服务于国家的民族工作，呈现出较为鲜明的政治色彩。不仅为云南本土培养了一大批民族研究工作者，也给中国的人类学与民族学留下了极为丰富的田野调查资料与学术遗产。当然，本学科领域中受“左”的思潮影响以及“大跃进”等风潮的影响也是在所难免的。

第三个阶段就是改革开放至今，云南的人类学与民族学学科进入了一个全面繁荣发展的新时期。首先表现为相关的研究机构得以迅速恢复重建，不仅新增了大批研究人员，出版了一系列民族调查与研究的论著，而且还逐步展开了与海内外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机构或研究人员的交流与合作。云南省民族研究所于1979年初得以恢复重建，创办了《民族调查研究》《民族学报》以及《民族研究译丛》等刊物，推出了“云南少数民族简史、简志丛书”“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史丛书”以及“社会文化人类学丛书”等系列丛书。1984年，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建立民族学研究所，该所一直坚持了分民族研究的路向，出版了一大批颇有影响的学术成果。云南大学等高校先后设置了民族学与人类学本科专业、硕士点以及博士点，于2001年开始招收博士生，并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就建成了博士后流动站和国家级重点学科；通过组织对全省少数民族的典型村寨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形成了一批较高质量的专题调研报告，还精心摄录了一大批人类学与民族学音像带和照片，极大地推进了学科的发展。

经过上述三个阶段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繁荣发展，云南的人类学与民族学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首先，学科建设迅速发展。作为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中最具优势的学科，人类学与民族学发挥了国家级重点学科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带动了政治学、经济学、生态学以及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发展，国际和国内的学术交流合作也日趋活跃。其次，研究基础进一步加强。人类学与民族学相关的专业化研究机构已遍及昆明、红河等州市，人员配置亦渐趋合理。尤其是2006年新建于云南大学的云南省民族研究院，通过整合资源、承担课题、培养人才，力图使人类学与民族学发展成为国内外有重要影响的学科。其三，基础理论研究凸显特色。云南学者在人类学与民族学的田野调查与实证研究方面成果丰硕，而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却相对薄弱，但近年来有些学者通过积极努力取得了一批相关的成果。尤其是关于生态文化、法律人类学、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民族政治学以及民族经济学等理论，已在海内外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此外，应用性研究也大大加强。云南学者近年来将研究视角和关注点更多地投向了现实问题，突出表现在关注民族地区发展，维护边疆安全、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等方面的问题，涉及民族关系调适、社会文化变迁、生态环境保护等问题的研究成果明显增多。

云南民族大学是我国最早成立的民族高等院校之一。民族学是云南民族大学最具优势和特色的学科，不仅是云南省省级重点学科和省院省校合作共建的重点

学科，也是国家级特色专业。早在 1979 年，我校的民族学专业就开始招收研究生，1986 年获硕士学位授予权，是云南首批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1987 年至今招收本科生，是我省第一所开设民族学本科专业的高校，迄今已为社会培养输送了大批从事民族文化研究的高素质专门人才；2001 年，我校的民族学被确定为省院省校教育合作项目——与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合作共建的省级重点学科，双方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学术交流等方面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合作，北京大学还先后派出数名社会文化人类学专业博士生对费孝通先生主持“魁阁”工作时期的云南楚雄禄村、大理喜洲和德宏那木寨等著名人类学田野点进行再研究，出版了一批受到学术界广泛好评的研究成果，推动了我校的民族学学科建设；2006 年，民族学被列为云南省“十一五”重点学科；2008 年被列为国家级特色专业，同年，民族学被列为国家立项建设的博士授权学科。经过近五年的建设，我校的民族学学科在人才队伍、科学研究、学术交流等方面成绩斐然：出版学术著作 50 多部，发表论文 300 多篇；获省部级科研成果奖 36 项；获国家社科基金课题 40 项，省部级课题 50 多项，各类项目经费总计 2300 多万元；主办或承办了“云南与中国的民族学/人类学学术研讨会”“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世界大会”“边疆民族关系与构建和谐社会学术研讨会”等国际、国内学术会议；先后邀请美国伊利诺大学莱曼（F. K. Lehman）教授，美国加州大学阎云翔教授，美国福尔曼大学白荷婷（K. P. Kaup）教授，英国伦敦大学罗兰（M. Rowlands）教授，中国社科院郝时远教授、刘世哲教授，北京大学马戎教授、王铭铭教授，厦门大学彭兆荣教授以及云南大学陈庆德教授等知名学者到校举办专题讲座。在几代民大人的共同努力下，我校的民族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于 2013 年 7 月获得学位授予权，标志着我校在人才培养体系方面取得了新突破，在办学层次上实现了新跨越，为学校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和重要的平台。

云南民族大学的民族学学科历史悠久、积淀深厚、人才荟萃、成果丰硕。马曜、王叔武、宋恩常等一批著名的民族学家曾在云南民族大学长期从事民族学教学与研究工作，在民族学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形成了深厚的学术积淀和优良的学术传统。多年来，该学科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各阶段的中心任务，积极开展社会科学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有重大影响的学术成果：老一辈民族学家参加了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编撰出版了“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等影响巨大的成果，提出了“直接过渡”等重要理论，不仅为党和国家制定民族政策、解决民族问题提供了重要依据，而且为我国民族理论的丰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改革开放以来，新一代学者主持完成了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大湄公河次区域各民族如何迎接全球化的挑战”、美国大自然协会“滇西北民族文化与生态保护发展行动计划”以及“中外民族学、文化

人类学研究比较”“滇川藏结合部区域经济协作与发展问题研究”“西部大开发与云南跨境民族文化多元化发展研究”“文化多样性与构建和谐世界研究——以大湄公河次区域为例”等一批国际合作与国家级重大项目和研究课题，出版了“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史丛书”“社会文化人类学丛书”等有影响的系列丛书。其中，受云南省政府的委托，云南民族大学于2001年与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合作完成了“滇西北民族文化与生态保护发展行动计划”的课题研究任务，其成果为三江并流地区世界自然遗产的申报成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1996—2006年期间编写的“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史丛书”被列为“九五国家重点图书”和云南民族文化大省建设规划的重点项目，对地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从2002年开始，我主持并带领课题组成员历时多年先后完成了对金平傣人、莽人、克木人、俐侎人、他留人、撒尼人、老缅甸等云南特有族群的调查研究，出版的最终研究成果《云南特有族群社会文化调查》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及政府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2009年，“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世界大会”在昆明成功举办，不仅进一步扩大了云南在全国人类学与民族学界的影响，而且促进了云南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之后，国家又先后提出把云南建设成为我国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和我国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的示范区，这不仅对促进云南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给云南民族学研究和民族文化繁荣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然而，从以上对云南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历史与现状的简介中不难看出：在抗战期间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民族识别与调查期间，云南曾经是全国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的中心，但随着老一辈人类学与民族学的专家学者逐步逝去，新一代专家学者又出现“断层”，以及学术重心的迁移等种种原因，云南的人类学与民族学呈现出了“风光不再”以及被“边缘化”的趋势。怎样才能重振云南人类学与民族学的雄风，为中国乃至世界的人类学与民族学贡献新的学术建树？这是当前云南学界亟须探讨的一个问题。云南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建设民族文化大省和民族文化强省的宏伟目标，为云南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我认为当务之急便是培育全国一流的学科，培育全国一流的学者，推出全国一流的科研成果，并结合省情和特色以期形成人类学与民族学的“云南模式”。

要实现新形势下云南人类学与民族学学科的大发展、大跨越，形成人类学与民族学的“云南模式”，需要社会各方面长期的共同努力，而云南民族大学更是责无旁贷。因此，为打造更大的科研平台，建设更强有力的学术团队，我校由我领衔申报了2012年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项目“民族文化专业能力实践基地建设”并获得批准，项目经费高达1200万元，这也是云南民族大学建校以来获准立项经费最高的项目。以此同时，为充分利用我校民族学、民族语

言、民族艺术、民族理论与政策等学科专业齐全、人才荟萃、成果丰硕的优势，有效整合全校的民族学学科专业与人才资源优势进行“大民族学”建设，不断提升学校的核心竞争力，学校于2012年12月挂牌成立了云南省民族文化研究院，下设民族语言研究所、民族艺术研究所、民族体育研究所、民族理论研究所、民族社会学研究所、民族教育研究所、跨境民族研究所、民族生态学研究所8个研究所。“民族文化专业能力实践基地建设”项目的实施和云南省民族文化研究院的成立，为我校的民族学文化研究搭建了重要的开放式科研平台，有利于推动民族学学科发展。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在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的当今时代，充分利用云南民族大学得天独厚的学科专业与人才资源优势，抓住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项目“民族文化专业能力实践基地建设”和民族学一级学科成为国家新增博士学位授权学科的契机，围绕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热点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推出一批民族文化研究的标志性成果，不断提升学校服务社会和文化传承创新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为此，我们策划并组织编写了这套“云南民族文化丛书”，分“云南民族文化遗产与变迁卷”“云南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卷”“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卷”“云南跨境民族文化卷”“云南民族艺术研究卷”以及“云南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卷”六个系列。本套丛书主要收录我校教师近年来民族文化研究的新成果，内容涉及云南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婚姻家庭、宗教信仰、节庆习俗、族群认同、传统体育、民族艺术以及民族文化保护传承与繁荣发展等诸多方面，较为全面地展现了云南民族大学在民族学学科建设方面取得的新进展。

总体而言，“云南民族文化丛书”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色：

第一，理论与实证研究相结合。本套丛书秉承民族学研究的优良传统，注重理论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丛书中既有对民族文化保护传承进行系统理论探讨的专著，也有对云南少数民族文化进行深入调查的个案研究。丛书力求从不同的视角来探讨当下云南民族文化多样性及其繁荣发展的规律和特点，提出全球化与现代化语境下民族文化保护传承的路径选择，必将为促进云南民族文化强省建设和民族文化繁荣发展发挥应有的作用。

第二，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相结合。长期以来，云南民族大学一直坚持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并重的原则，以学科建设推动人才培养，以人才培养促进学科建设。本套丛书既有关注民族文化的学术专著，也有加强学科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的系列教材。例如，内容涉及纳西、傣、彝、傈僳、景颇、拉祜、哈尼、苗、壮、佤等11个语种的语音、文字、词汇、会话等方面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教材，以及陀螺运动、秋千运动、蹴球运动、射弩运动、高脚竞速运动等云

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教材的出版，不仅对促进民族学学科和专业建设起到积极作用，而且对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三，田野调查与文献资料相结合。自20世纪20年代英国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开创了人类学现代田野工作范式以来，我们不难发现，中外经典的民族志著作，无一不是建立在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基础之上的；而近年来的民族学研究在倡导田野调查的同时，也强调了历史文献资料对民族志文本撰写的重要性。本套丛书的另一特色是注重田野调查与文献资料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丛书中的不少专著，就是其作者在长期深入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获取大量鲜活的第一手素材并参考借鉴了云南丰富的地方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撰写的。

第四，学术研究与服务社会相结合。云南民族大学老一辈学者的民族学研究成果，曾经为党和国家制定民族政策、做好民族工作提供了理论支持，为民族文化传承和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套丛书立足于国家战略的高度，从不同的层面和视角关注底蕴深厚、异彩纷呈的云南民族文化及其繁荣发展与保护传承问题，力求为云南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示范区的建设以及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和谐发展、跨越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深厚的学术积淀和传承是学术创新的重要源泉。我们不揣浅陋呈现给读者的这套丛书，既是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的标志性学术成果，也是我校民族学博士学科建设取得的又一突破性进展。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够提高我校的人才培养质量、推动民族学学科建设、促进云南民族文化繁荣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当然，由于时间仓促和编撰者水平有限等种种原因，这套丛书肯定会存在诸多不足之处，我们诚恳期待学界同仁的批评指正。

2013年国庆于昆明莲花池畔

序

子志月是我指导的2010级档案学博士生。入学之前，她已在一家公司工作了14年，为了考博，她不仅毅然辞职，而且还选择了一个自己从未涉足的陌生领域。鉴于她的年龄、经历和学力背景，我很担心她能否顺利毕业。但事实证明是我多虑了。在读期间，她除了主持完成2项校级研究生科研项目，参与完成多项省部级项目外，还发表了近10篇学术论文，顺利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通过了论文答辩，按时毕业和就业。这本书就是在她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完成的，也是她3年来从事研究工作的阶段性成果，值得庆贺。

子志月的博士论文选题来源于我主持的2010年教育部西部项目“云南少数民族口述历史档案抢救保护及国际合作研究”，该项目属于跨学科研究，即档案学与口述史（学）的结合，也是我国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中需要重视的一个问题。但国内这方面的工作才开始起步，成果也很有限。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关于口述档案开发利用的研究较少，并且主要局限于编研原则、程序、方法的探讨，很少涉及口述档案开发利用的方法、途径、措施等。关于少数民族口述档案开发利用的研究就更少，并且主要集中在抢救保护方面，这反映出当前开发利用工作尚未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由于缺乏理论研究的引导，人们对少数民族口述档案的独特功能认识不足，少数民族口述档案的开发利用未能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由于缺乏系统科学的理论指导，少数民族口述档案开发利用工作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容易走弯路甚至走错路。

子志月的专著《云南少数民族口述档案开发利用研究》是对云南这一特定区域少数民族口述历史档案开发利用问题的初步探索，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如上所述，口述历史的开发利用研究仍是当前我国档案学界的一个薄弱环节，目前仅有少量文章涉及这方面的内容，且缺乏深度，而少数民族口述历史的开发利用研究则几乎是一项空白。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种类最多的边疆省份，25个世居少数民族特别是无文字民族沿袭了数千年口耳相传的记忆方式，流传下来的活态口头文化丰富多彩，数量巨大，形成了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群体记忆，口传心授”的鲜明特点。但长期以来，云南少数民族口述档案信息资源未能得到充分挖掘，其多方面的重要价值和作用也未能得到充分发挥。目前开展的工作还停留在抢救

和保护层面,尚未进入到开发利用的最终阶段。因此对这一地区口述档案的开发利用问题进行研究,显然比其他地区更具有代表性和针对性。

当前,云南具有边疆民族特色的档案事业正处在跨越式发展的关键时期,国家档案局于2010年3月批准将云南省作为全国开展抢救保护少数民族口述历史档案的试点地区。省委、省政府也高度重视此项工作,于2013年10月批准省档案局(馆)设立征集整理处。在此契机下,如何合理、适度开发利用云南少数民族口述档案,使各民族丰富多彩的口承文化通过发掘整理、价值评估、产业开发后,作为一种信息资源直接参与现代经济生活并产生效益,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为此,作者在认真总结和分析云南少数民族口述档案开发利用所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针对云南少数民族口述档案的特点,并结合当前的研究成果,试图对云南少数民族口述档案开发利用应遵循的原则、开发利用的模式以及一些具体措施进行探讨。对作者提出的一些想法,我认为是有道理的。我在这里想表达的是,我国口述历史档案资源十分丰富,领域十分宽泛,几乎涉及社会的经济建设、政治生活、社会管理等各个层面,仅以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为例,目前已达87万项,面对如此庞大的资源,我们究竟开发利用了多少?又有多少开发利用成果产生了社会影响力和推动力?目前,大量口述历史资源还没有转化为档案资源,已转化为档案的又不能尽快向公众开放和提供利用。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面临的口述档案开发利用任务仍相当艰巨,而档案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还不够,有的理论观点脱离实际,还不能很好地用于指导实践。由此看来,我们的研究工作同样是任重道远。

当然,本书也存在一些不足,总的感觉是“口头文化”的口味较重,而“口述档案”的味道不浓。

子志月现在到高校从事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工作,希望她能坚持不懈地沿着自己前面铺就的道路,为我国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多出成果,取得更大的成绩。

是为序!

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陈子丹

2014年3月23日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云南少数民族口述档案概述	(23)
第一节 云南少数民族口述档案概念的界定	(23)
第二节 云南少数民族口述档案的种类	(30)
第三节 云南少数民族口述档案的特点	(37)
第二章 云南少数民族口述档案的价值与作用	(41)
第一节 云南少数民族口述档案的价值	(41)
第二节 云南少数民族口述档案的作用	(45)
第三章 云南少数民族口述档案抢救保护的历史回顾	(55)
第一节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对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调查	(55)
第二节 中国民族民间十部文艺集成志书的编写	(59)
第三节 口头文学遗产抢救的“三大战役”	(62)
第四节 21 世纪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	(67)
第四章 云南少数民族口述档案开发利用的现状	(71)
第一节 云南少数民族口述档案开发利用取得的成绩	(71)
第二节 云南少数民族口述档案开发利用存在的问题	(87)
第五章 云南少数民族口述档案开发利用的意义	(97)
第一节 云南少数民族口述档案开发利用的概念	(97)
第二节 云南少数民族口述档案开发利用的意义	(98)
第六章 云南少数民族口述档案开发利用的对策探析	(104)
第一节 云南少数民族口述档案开发利用的原则	(104)

第二节	云南少数民族口述档案开发利用的模式·····	(109)
第三节	云南少数民族口述档案开发利用的措施·····	(112)
结 语	·····	(142)
参考文献	·····	(145)
后 记	·····	(157)

绪 论

一、研究的背景

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种类最多、人口较少民族最多、特有民族最多、跨境民族最多的边疆省份。^① 其中仅人口在 5 000 人以上的少数民族就有 25 个,傣族、白族、傈僳族、拉祜族、哈尼族、佤族、景颇族、阿昌族、布朗族、纳西族、普米族、基诺族、德昂族、怒族、独龙族等 15 个民族为云南独有的,壮族、傣族、布依族、苗族、瑶族、彝族、哈尼族、景颇族、傈僳族、拉祜族、怒族、阿昌族、独龙族、佤族、布朗族、德昂族等 16 个民族跨国境而居。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和生产生活实践中,云南各少数民族形成了丰富多彩、独具特色的语言文字、音乐舞蹈、民间文学、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民族医药以及人文掌故等文化遗产,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多样性做出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但由于云南很多少数民族只有语言而没有自己的文字,长期以来,民族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宗教信仰等民族记忆,大都主要依靠口传心授的方式世代代流传,其优秀的文化遗产很多没有形成正式的文献记录。即便有文字的少数民族,其文字绝大多数只是被土司、东巴、毕摩、长老、和尚、工匠以及民间艺人等少数人掌握,很多民族集体记忆也只能以口耳相传的方式得以流传和保存。近年来,随着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正发生变迁,云南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一些珍贵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民族音乐、歌舞、民间文学以及民俗活动等正逐渐消失。在许多少数民族村寨,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楼房逐步取代了少数民族的传统民居,传统的民族服饰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视野,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青少年不愿意说自己的语言,对自己的母语逐渐生疏,宗教信仰越来越世俗化,民族文化遗产的传承后继乏人,特别是随着精通并掌握民族文化的民间艺人的离世,许多优秀民族传统文化正面临逐渐消失的危险境地。云

^① 和少英:《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本体论”问题》,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南少数民族记忆口耳相传的传承特殊性和保护的不易,使很多民族文化遗产面临严峻的生存考验,民族文化面临着严重受损甚至“历史性断代”的危险,文化的多样性正在逐渐消失。^①若不及时抢救保护,许多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将面临消亡甚至失传的危险。

当前人们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主要体现在两种途径和方式上:一是“传承”,二是“记忆”。所谓“传承”,即通过“传承人”或“接班人”的方式来实现民族文化遗产的传承,这种方式是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得以存活与继承的根本途径,也是最为艰难的一种保护方式,可能会因为传承人的离世、断代,而导致其承载的此项民族文化遗产消失。所谓“记忆”,即通过文字记载、照片、录音、录像、数字化等方式对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加以记录,物化为少数民族口述档案并长久保存,从而实现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传承和发展。^②通过少数民族口述档案这一载体,留住了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记忆,即使失去了传承人,人们依然能通过档案查询他们曾经灿烂过的足迹,甚至使其“复活”。因此,从少数民族文化“群体记忆,口传心授”的特点出发,建立少数民族口述档案已经成为了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构建少数民族集体记忆的重要方式和手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少数民族文化的抢救保护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采取了收集、整理和保管少数民族口述档案等一系列保护方法和措施,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得到有效保护和弘扬。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为了给党和国家制定少数民族政策,也为了给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提供理论依据,国家组织力量对当时已确认的50个少数民族开展普遍调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举世罕见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和文化大调查,收集到包括少数民族社会形态、艺术、民俗、节庆、传统技艺、生产技术等方面的资料共计4000余万字。^③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成立了全国性的民间文艺研究机构和民俗学会,并在各省、市、自治区建立分会,对民间文艺进行调查,特别是在搜集整理少数民族的语言、史诗、叙事诗、神话、民间文学和民俗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④面对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日渐湮灭、损毁和流失的危险,国家本着“抢救第一,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动员各种力量努力予以抢救性的保护、发掘。1979年,由文化部和国家民委等部门联合发起和主办的《中国民族民间文

① 黄凤平:《努力守护民族记忆 积极传承民族文化——云南多元民族档案工作的行与思》,载《档案学研究》,2011年第4期。

② 吕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野中的口述档案》,载《甘肃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③ 何星亮:《30年来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载《中国民族报》,2008年7月25日。

④ 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第89页。

艺集成志书》编纂、出版的工作全面展开,历时30年,2009年10月,《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全部出版完成,这一被称为“文艺学大百科全书”和“文化长城”的巨大工程囊括了56个民族的民间文艺成果,较为完整地收集和展示了我国各民族的传统文艺。

2002年11月,文化部启动了“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同时还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纳入其中。^①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2004年8月28日,我国正式加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和2005年12月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相继出台后,举国上下掀起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潮。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市(自治州)、县(区)文化部门也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普查、申报列为重要的工作任务,许多弥足珍贵的和濒临灭绝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纷纷被发掘、抢救和整理出来,同时形成了大量的口述历史档案加以保存。党的十六大报告首次将保护重要文化遗产和优秀民间艺术,扶持体现民间特色和国家水准的重大文化项目等内容写入政治报告中,对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弘扬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云南省部分州、市、县民委先后成立了专门机构负责民族古籍抢救、整理和出版,组织了大量的专业人才进行大规模的抢救与整理工作。经初步调查,查明了云南各民族文献古籍10万余册(卷),口碑古籍上万种。现在约2万余册(卷)文献古籍、3千多种口碑古籍已经得到了抢救保护;傣、彝、回、纳西、哈尼、苗、白、瑶、藏、基诺、普米、景颇和傈僳等民族的500多册、3000余种古籍被翻译、整理,并得到了出版发行;集数十人20年心血翻译整理出版的长达5000多万字的《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100卷,其规模之大,在全国古籍整理行业堪称全国第一,荣获国家图书奖荣誉奖,在国内外引起了轰动;所有这些,都为云南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开发做出了积极的贡献。^②另外,云南省民委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2002年启动“26个民族口承文化工程”,编纂的《云南民族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总目提要》于2008年7月正式出版。全书分为《神话传说卷》《民间故事卷》《史诗歌谣卷》三卷,每卷又分为上卷和下卷,共收录云南26个民族具有代表性的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19600项。这是云南省首次大规模地对有关部门和一大批民间艺人以及专家学者数十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搜集、抢救、整理云南各民族民间口传文化遗产所取得的成就进行的大总结和大盘点。

作为全国第一个民族民间传统文化遗产保护的地方性法规,《云南省民族民

① 向云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47页。

② 郭家骥:《云南民族文化发展报告》,载《贵州民族研究》,2004年第3期。